



品读



蕴藏在声音里的文化密码

——评《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

沈 鲁

方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一个地方的戏剧、曲艺、歌谣、谜语等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当然地方文化还包括人情、风俗、习惯、服饰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特征有时候也会反映在方言里。方言研究实在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一把钥匙。都昌方言沉淀着赣北地区独特的文化记忆与生活方式。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昌大学客家方言与语言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卢继芳所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5年1月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的《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在全县24个乡镇65个方言点深度调查的基础上挖掘了赣语都片都昌方言的语音特点。全书共分五章,从语音面貌研究,到其与中古音系的历时比较,再到都昌方言内部差异的地理分布与比较,全书形成了“微观描写——历史溯源——空间分布”的三维研究结构。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关注了都昌方言与吴语、湘语等邻近方言的关系。著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还展示了都昌方言中宝贵的文化资源,进一步深化了赣北赣语区域演变特征研究,对于挖掘深化赣语历史发展、吴赣湘三地区域文化关系以及汉语方言演化也具有重要价值。

都昌方言首先是一部“口传的地方史”。每一个特殊的语音现象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迁徙与文化交融。书中细致记录的文白异读现象,认同历史层次是若干有对应关系的音类系统地并存于同一共时系统的叠置现象的观点。都昌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记录了都昌自汉代建制以来悠久的历史发展。都昌方言在古敷母、古微母、见系字、日母字声母上存在文白异读现象;韵母上主要表现在撮撮、蟹撮、臻撮、梗撮、通撮;声调上入字也存在文白异读现象和文白配合关系。相较于文读,白读更具有当地“乡土”色彩,例如“尾^{尾尾}读 ui^{ui}”、“尾^{尾尾}尾^{尾尾}”白读 mi^{mi}、“夏^{夏天}”文读 xia^{xia}、“夏^{夏天}”白读 ha^{ha}”。这不只是简单的语音变异,而是自古

以来语言在都昌土地上层层叠加的历史见证。都昌地处鄱阳湖畔,位于赣江、鄱阳湖、长江航道重要节点。历史上屡次移民潮在此交汇,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方向的移民带来的语言交汇,在都昌方言中沉淀为复杂的语音系统。都昌的语言系统真实地记录了都昌人的迁徙史与文化史。

语音的选择与保留,往往反映了该地区居民的集体心理与文化认同。都昌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特征,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今天,这种对古老语音特征的坚守,实质上是地方社群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自觉维护。尤其是都昌方言中独特的声调系统构成了一种仅属于都昌人的声音标识,这种声音上的“独特性”强化了本地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代,这种通过方言维系的地方认同显得尤为珍贵。

语音的演变往往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详细地对比了不同乡镇、不同年龄层的语音变异,勾勒出一幅动态的社会结构图景。老一辈与年轻人之间的语音差异,反映了文化传承的断裂与延续。不同乡镇发音区别,则映射出了乡镇之间的地缘关系及共有的历史渊源和个性化的发展。通过该书的描述,我们得以观察都昌社会结构的微观变迁。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地域文化标记的方言传承与保护必定会面临挑战。《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在记录方言现状的同时,也保留了最原始的可供考查的语音资料。书中所记录的许多特殊发音,在年轻一代中已经日益罕见;一些传统的语音区别特征,在普通话的影响下逐渐模糊。都昌方言中,新派(青年层)与老派(老年层)的语音差异显著,集中体现在声母、声调与文白异读三个方面。声母上老派保留更多古音特征,比如来母拼音韵母读塞音 [dʌʔ]、止撮精组字读浊塞擦音 [dz]、溪群母多读零声母;而新派则明显向普通话靠拢,表现为边音化、擦音

化以及声母的重新出现。声调上老派能够区分阴入与阳入调,新派则出现调类合并,如全浊入与次清入合流。文白异读方面,老派多保留本地白读层,音韵存古;新派则更倾向于文读层,读音更接近普通话。整体上,这些差异反映了方言在年龄层间的历时演变,新派语音变化快、受普通话影响深,老派则相对保守,存留了更多早期的方言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具有了文化抢救的性质。

《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语音资料,书中的同音字汇总表极大地保留了都昌方言中的特色文化。例如“豚”指小猪,“乌灯”指灭灯,“昼”指上午,保留了古语色彩;“禾花”指水稻穗花;“过果”指患麻疹,“做胎人嘢”“做好人”特指孩子患麻疹的委婉说法;“麻间饼”指本地中秋月饼;“买水”指封殓前亲友要去七个不同姓的村庄的七口池塘取水给逝者洗身体;“做夜斋”指老人去世,出殡日请道士为其超度;“偷发”指建新房时屋主上山选择梁木后趁山林主人不注意砍掉,然后在树兜上放个红包。这些宝贵的材料不仅如实记录了当地的方言而且反映出了都昌的文化习俗,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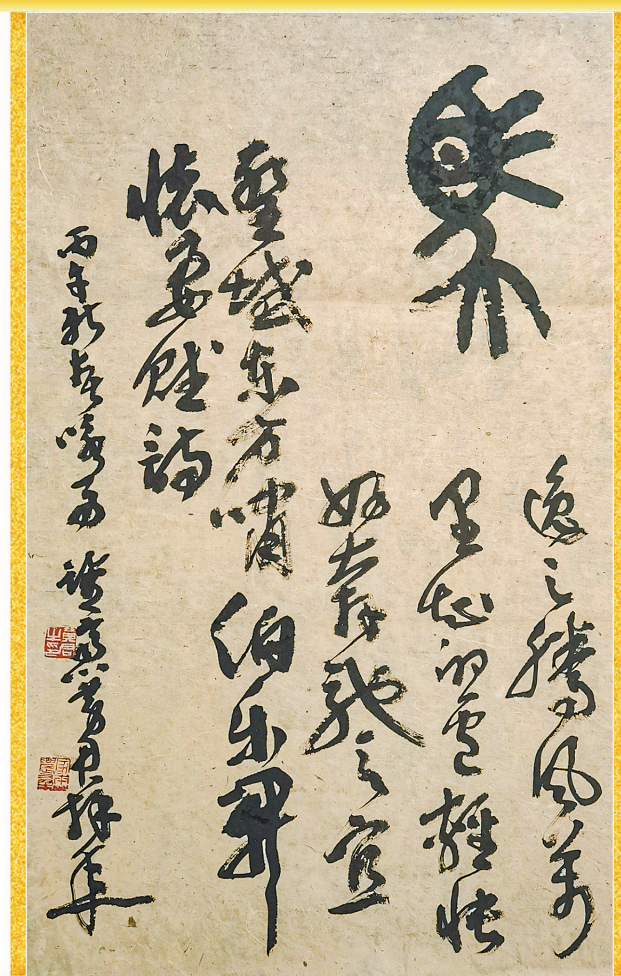
《江西都昌方言语音研究》是一座方言民俗文化的博物馆,收存了都昌人的历史记忆;它是一本地方文化的密码本,记录着鄱阳湖畔独特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方言研究提醒我们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可见的物质文化遗产上,也存在于这些看似平常的物音之中。

当我们翻开这本书,耳边仿佛响起鄱阳湖的浪声与都昌乡音交织的旋律。方言语音研究始终指向一个问题——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如何为这些独特的声音以及它们所承载的独特文化保留一片生存的空间?只有在当下准确地记录并保存才能为后世留下可供参考的宝贵材料。

(作者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

M 名家有约

黄君书法作品



丙申咏马贺岁诗帖

作者简介

黄君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型书法家、诗人。他1961年生于江西修水,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1993年借调北京,后一直在京从事书法、诗词创作和研究等工作。

黄君先生2002年荣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2005年和2012年两度获评“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兼书画委员会副主任。

黄君先生已出版书法、诗歌、佛教研究等各类著作40余部,曾经在中国美术馆、中国文字博物馆、江西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十多次。黄君先生是北宋大书法家、大诗人黄庭坚的嫡系后裔,他主编的《黄庭坚书法全集》获全国优秀出版奖。2010年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拍卖的黄庭坚《砥柱铭卷》,就是由黄君先生撰写长篇鉴定文章,该作品以4.368亿元拍卖成交,至今仍保持中国艺术品单件拍卖最高价纪录。

我曾用过的自行车

陈 琬

在那个票证盛行的年代,我曾经用过的两部自行车早已成为往事,可是购买及使用的过程在我人生的记忆中,却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的第一部自行车是永久二八大杠,朋友送给我的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的。那个时候的华侨商店在第五百货商场对面(今五丰宾馆西侧),花了一百多元钱买的。那个年代为了鼓励华侨汇钱回来,根据汇款的多少发放侨汇券,可以购买紧俏物资,名牌自行车就是其中之一。这部车子我骑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大了一点,骑得有点吃力,我把它送给了姐夫。他在214闽赣物资供应站工作,那个单位80%是转业军人,党员的比例非常高。214在造船厂旁边,离家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来去不方便,这部车子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姐夫每次看见我都说车子质量很好。这辆永久牌自行车在他们家里使用了20多年,姐夫非常珍惜永久牌自行车,经常擦洗上油,基本上没有大修过。

我的第二辆自行车是凤凰二六型的轻便车。是在庐山购买的,花了157元钱。当时表姐在庐山五交化公司工作,用内部指标帮我购买的。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辆自行车的价格,大约是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这辆自行车成了我的骄傲。那个时候我家住在二楼,楼梯很陡。为了保障自行车的安全,我每天上下班都是扛上扛下,一点都不累。当时我在化工厂上班,有一天我骑车回家,一个朋友来问,问我新的自行车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在楼上房间里。带他过来看了一眼,他说你这哪是新的自行车,完全是旧的,我当时大吃一惊。然后跑过去一看,果真车子蒙了一层锈迹。因为有几回遇到氯气泄露,氯气的腐蚀性很强,正好又遇到雨季,结果车子蒙上了一层锈。我当时大吃一惊,马上找来了机油,好好地擦洗了一遍。因为刚刚被腐蚀,所以锈迹很快被干净了,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当时,如果把自行车借人用一下,那真是天大的人情,碗大的疤。

有一天晚上,我从住在姚家洼的朋友家中骑车回来,正好路灯坏了。骑到庐山路口突然感到危险,立即双手刹车,新车质量就是好,车子立即停在原地不动。我双脚垫底,一看车已经靠在栏杆边上,距离不到一寸。如果不是及时刹车,那就要出一个大的事故。直觉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楚,有时候灵验得你都不敢相信事实。作为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我常常带着年轻人出去搞活动,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出去的,其中包括到九江县的涌泉洞。我们还骑着自行车到莲花洞,然后从好汉坡登山。在山上搞一个联欢活动,走下山再骑着自行车回来。我双手可以不扶自行车龙头,直接从高坡上冲下来,车速总是第一,真有点像现代年轻人飙车的感觉。那个时候一部凤凰自行车,不亚于现在有一部小轿车。

女儿很小的时候,晚上非要跟着我一起出去玩,去之前跟她说好回来不能在自行车上睡觉,因为她一睡着了,我就没办法骑车子带她。可是每一次快到家的时候她就睡着了,我只好下车扶着车走。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延安山同文里,到家有一个很陡的坡。我只能把自行车放在坡下,把她抱回家,再回头来扶车子。那个时候住的地方是只有12个平方米的房子,无厨房无卫生间。后来隔了一间小房子,在吃饭的地方放了一个书柜,我称它为“厨房”。这个房子白天要开灯,下雨要接漏水,最多的就是“盐鱼螺”(九江方言,俗称鼻涕虫,学名蛭类),每天晚上要抓一百多条,在一张纸上撒点盐,然后把“盐鱼螺”放上面去,很快就会化成水。住的地方虽然拥挤,可我还是为心爱的自行车专门留了地方。公共厕所离住的地方有100多米,有的时候请朋友来家中小酌,特别是喝啤酒的时候就非常尴尬。我的一个老大哥曾经跟我说,从你家去厕所方便完了,走回来刚到你家,我又想上厕所了。他是无意中开了一个玩笑,可是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就暗自发誓,有钱了一定要先买房子。1992年我下海了,1994年在九江买了第一套商品房,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带卫生间。未装修之前,我一个人在房间准备打家具的木头堆上睡了一觉。空空的房子,走路和咳嗽的回声至今仍在耳边震荡,此乃后话。

有人说骑自行车就好像会游泳一样,属于肌肉记忆,此话真的不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幼儿园的操场上重新骑起了自行车,真的是跨上去就会。那两辆自行车,把我带到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从此一路前行。愿自行车的铃声警醒着我的人生,一直追求下去。

讲述

武宁山水南岳情

陈林森

去年金秋时节,我和老伴应邀前往武宁参加原南岳中学73届初中毕业生聚会。

南岳是武宁县曾经的乡级行政区,2002年并入船滩镇。1969年,当时的南岳公社创办中学。我是1968年的下放知青,1969年当民办教师,1970年转代课,1971年调入南岳中学。73届学生是1971年进校,我教语文,钟兴锡老师教数学,方由海老师教物理兼班主任。

这个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恰逢高中合并,部分同学进入船滩中学读高中。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岳中学存续期间,一时藏龙卧虎,鸾翔凤集。席芳松,原船滩中学校长,下放南岳中学当校长。他腹笥充盈,有一次给学生讲鲁迅,连讲三节课,妙趣横生,笑语盈堂。后来担任武宁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周绪徽,祖籍安徽,数理化全能,编辑、作曲、导演、器乐等才艺皆通,后为武宁一中校长。袁敬儒,南昌人,因“右派”身份发配到南岳中学,落实政策后调入武宁一中,历任教导主任、副校长,又作为党外人士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他是学校公认的“数学王牌”。方由海九师毕业,聪明过人,我的“职场发小”,我俩比邻而居,抱团生活,情同手足。他们都是“救人”(武宁方言,很厉害的人)。那几年,除学校外,卫生院、供销社等单位,也有育才。其间,这些人先后调离,我也于1973年离开南岳中学。他们是南岳山区一个时段的光彩。可是由于人口太少地太偏,1973年高中撤销,几年后初中撤销;再后来,随着乡镇合并,这个从前的公社所在地连一所小学也没有。最后,因人口衰减,卫生院也撤离了。

根据同学聚会筹委会安排,3日上午座谈、合影,下午到4A级旅游景区长水游览。长水位于武宁罗坪镇,2007年温家宝总理视察武宁,在这里题写了“山水武宁”四个字,成为武宁县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

这次聚会由袁达文、吴远智等同学牵头,雷显林负责与我联系,对我们照顾非常周到。显林少年时代玉树临风,恢复高考后考取了师范,改变了命运。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唐维发代表同学们表达了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他居然还把我52年前写的一首诗当场背诵出来了。

我下放南岳公社的第一站是黄沙大队第6生产队。大家特意为我安排活动,由家住黄沙

的吴远智、方家富同学陪同,两辆小车搭载众人,从县城出发,经船滩、吴湾、易溪、南岳,向船滩镇北部像狭长“半岛”的尖端般伸向大山深处的黄沙村驶去。这是武宁县乃至赣西北最偏远的小山村。

我刚下放时,南岳交通极为落后,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运输全靠肩挑背扛。途中险要处很多,最险的是船滩进去3公里外一个叫黑炭岩的地方:头顶处有一块往外倒扣的巨型岩石,脚下的路又往里缩,下面是悬崖,一失足成千古恨。1970年冬,在“学大寨”高潮中修路,我被抽调到指挥部搞宣传。有一次对黑炭岩实施爆破时,三位民工不幸牺牲,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歌剧《黑炭岩下三英雄》(后更名为《战备路上三英雄》)。1971年公路贯通,这条用鲜血和汗水凝成的公路,给山区人民带来了福祉。今天,“高路人云端”,砂石路早就变成了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坦途,汽车、摩托往来不绝,每天有一趟班车从黄沙经南岳、易溪、船滩开往县城。

途经易溪村(当年的易星大队)时,我在达文的陪同下,看望了当年的大队支书谢光武老人。易溪是我下放的第二站,1969年至1970年,我在那里的长榜村教了一年村小,谢支书就是长榜人。晚上到大队开会,他常带我去给大队干部读报,然后听他们开会。他还说要发展我入党,虽然没有实现,但我仍然感激他。谢书记今年92岁,我们到村时,他正在菜园里劳动。

我们来到船滩镇南岳村,这里就是原南岳公社所在地。昔日的南岳中学,在小河(南岳港)对面,河面上是一座用杉木架设的便桥,一旦山洪暴发,木桥就可能被冲走。20世纪90年代修建了水泥桥,现在所见的是1998年以后重修加固的。我们步行到河对岸,原来的校舍荡然无存,在学校旧址建造的民房也沦为旧屋,没有住人的痕迹,周边除了荒芜的野草和几只嘎嘎叫的鹅,只剩一棵有数百年树龄的苦楝树,以其苍老的容颜在无声地诉说着悠悠往事。大家指着空无的地址,辨认当年我们分别住在哪里。师生们在老树张开的巨伞下合影,共同祭奠逝去的岁月。

到了大山深处的黄沙,我们发现当年插队时的村庄已不复存在。村民在山上的房子大

多搬迁到山下马路边,干打垒的土坯房只留下个别的“参照物”,放眼都是漂亮的楼房,与山外的房子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我见一村民家门前停着一辆大奔。家富说,黄沙这个只有七八百人的行政村,奔驰、宝马这样的豪车就有十多部。方由海说,改革开放几十年,山区老百姓的家底已经相当殷实。我在抖音上看到,去探望会计的遗孀。当年那个丰盈的少妇,就是眼前这位枯瘦的老妪,不过在她笑的时候,眉眼处仍有一丝半个多世纪前的风仪。

从下放的那年算起,57年过去,物是人非,当年的社员存世的已经不多。黄沙6队的生产队长已经谢世;政治队长已有90多岁,搬到县城去住,没有联系上。我们两个知青当年寄宿在生产队会计方家林家中,家林早已作古,其妻尚在。在我和老伴路上偶遇的家林小儿子的引领下,刚过20岁,就扮演冯骥才笔下“挑山工”的角色,多次肩挑七八十斤半成品木桶,脚踩草鞋,跟着社员,从黄沙出发,攀登崎岖陡峭的山路,翻越眼前这座海拔1300多米的高山,挑到山那边的湖北去销售。天不亮就启程,艰难跋涉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通山县高湖公社。有一次过港沟时,我不慎跌了一跤,咬咬牙,又坚持了下来。

此时,阳光炽烈,气温与山外不相上下,由于久旱不雨,在马路听不到昔日港溪里那不绝于耳的潺潺流水声。然而在我的心灵深处,却有一道永不干涸的溪流,它从太阳山下流起,流过黄沙,流过南岳,流过长榜和易溪,流淌的是我们的青春年华,流经了人生最初的洗礼,穿越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回眸处,依然涌动着世间最美丽最令人怀恋的浪花。